

從中央集權到中共政權—— 探究和平協議與一國兩制的根源

跋熱·達瓦才仁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川普上任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言而無信的焦慮和不安開始浮上檯面。¹ 從香港反送中和臺灣人民對兩岸和平協議的激烈反應，亦表明問題的焦點並不是「送中」或「和平協議」本身，而是港、臺人民對中國政府的極端不信任。

西藏是唯一和中國簽訂和平協議並施行實質上一國兩制的國家或地區，因此西藏的經歷就成了大家都想要借鑑的一個例子。

壹、中共輕諾寡信始自侵吞西藏

西藏在歷史上雖曾與中國、印度、尼泊爾等鄰國發生戰爭衝突，並失去了部分邊界地區的領土，但也一直維持著主權的獨立，直到 1950 年中國十萬大軍入侵西藏並打敗了只有八千餘人的西藏軍隊。當戰場失利的消息傳來時，西藏全國陷入混亂，但戰勝的中國軍隊卻停止前進，並向西藏政府伸出橄欖枝，提議進行和談。西藏人雖然滿腹狐疑，但即使全國動員向國際求助，仍是遠水不解近渴且結果悲觀，最後終是孤立無援。因此，相對於被中共軍事征服，和談對西藏而言自然更有吸引力。結果，所謂和談不過是把中共早已提出的條件變成條約條文而已。即使如此，中共除了西藏要「回到中國的懷抱」，協議也承諾「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尊重信仰自由、發展藏語文等；西藏代表試圖提出一些不同要求時，還被中國代表拍桌子惡言威嚇。

1 蓬佩奧：「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問題，就是總是破壞承諾。習近平說不會將南海軍事化，但他食言。在香港問題上也是，我們得確保中國不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至於新疆問題，情況真的很糟，那確實是屬中國主權的內政事務，但中國正在從事大規模的人權迫害。」（鄭崇生，2019）

最終，西藏人還是接受了表面看來不算最糟的結果，藏、中雙方簽訂了「和平協議」——《十七條協議》（達瓦才仁，2019a）。

如眾所知，簽訂協議八年後，1959年達賴喇嘛不得不流亡印度。²中國在西藏造成一百二十萬藏人非正常死亡，八千餘座寺院被摧毀。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幾乎與當初簽訂的協議的每一條內容都背道而馳。

中共要和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除了以此作為占領西藏的踏板，主要還是為了迴避國際社會「使用威脅或武力取得之領土不得承認為合法」的原則，³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加盟國都承諾的「不用武力侵略來獲得新領土」（劉漢城，2019，9–10）。正因為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要遵守協議，因此在和談時，先貌似寬宏大量地慷慨允諾，簽約後的實際作為卻是錙銖必較並違背承諾（達瓦才仁，2019b）。也就是說，中共的輕諾寡信其來有自，並非現在才有。

貳、抗拒一國一制而被滅族的羌人

檢視歷史，西藏人不只是被中共政府的「和平協議」欺瞞，還曾和香港反送中一樣，因為抗拒中國漢朝的「一國一制」而慘遭種族滅絕。此處所指抗拒「一國一制」而遭滅族的西藏人，指的是中文史料所稱古青海的「羌人」；西藏史料記載他們是西藏原始六氏族中的「東」氏，意謂西部遊牧之民，說他們和藏人一樣，也認為自己是猴子的後代（格勒，1988）。⁴

中國漢朝時，漢武帝對外擴張，占領了現青海東部及湟水流域的羌人領土，並設立殖民統治「初開河西，列置四郡」。羌人部落分立，面對中國侵門踏戶，雖也「解仇結盟」進行對抗，但實際上各部落都有其自由意志，不論

2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白皮書記載：「西元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由軍官王其美率領的解放軍四萬餘人分八路向康區首府昌都發起進攻，迅速大敗只有八千餘人的西藏軍隊……西曆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西藏大會召開緊急會議，並請求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西藏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對達賴喇嘛的親政，站在他們後面的將是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的西藏人民。我們向世界人民呼籲以和平手段制止對西藏的侵略。』……在打敗西藏東部和北部的少數西藏軍隊後，中國解放軍約幾萬人向西藏中部地區推進，同時，由於沒有得到強有力的國際支援，迫使達賴喇嘛和西藏政府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國政府進行和談。（西藏流亡政府，1993）

3 最早的如1928年8月27日各國簽署的《關於廢棄戰爭做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承諾在法律上禁止以戰爭行為作為國家政策工具，從此「戰爭非法化」由純道德訴求，轉變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條約原則。

4 亦見《隋書·黨項傳》。

戰、和，仍由各部落首領自行決定。因此，控制羌人領袖就成為漢朝占領這些地方的主要手段。⁵

有時候，漢朝也會以和解（和平談判）為名，將藏（羌）人領袖集中後集體屠戮；⁶ 對投降或被俘的藏（羌）人，則把他們趕離家園，遷徙到中國境內，置於漢朝的直接統治下，形成一國一制。結果，那些投降內徙的羌人常因不堪中國官員的暴虐而造反，中國史料將此稱為「羌亂」。最後漢朝採用「護羌校尉」段熲的主張，將遷徙到中國境內的數十萬羌人，不論反抗與否均屠戮殆盡。⁷ 因此，段熲滅羌成了中國史上成功治理異族禍亂的著名故事，而為人所津津樂道。

參、專制暴政是難以承受的壓迫

古今對照，雖然一個是部落制下的古藏（羌）人，另一個是充分享受自由法治的現代香港，但他們面對的東漢皇朝或現代中共統治，卻是同質性很高的專制統治，可謂是一脈相承。因此，對中國大陸人民而言，中共的專制統治是常態，對侵害壓迫無感，或是無可奈何；但對享受過自由法治的香港人而言，則是難於承受的痛苦，只有奮起反抗。同樣地，東漢的中國人對朝廷中央集權的壓榨統治，也習以為常而默默承受；但羌人是自由的民族，即使已經繳械投降歸順，仍因不堪忍受中國的暴虐統治而揭竿起義。史料所記載因某官員侵害而造成羌人反抗等，其實和香港的反送中一樣，不過是導火線而已，其問題的根源都是獨裁專制。

只是，古代的段熲可以很輕鬆地屠殺早已繳械投降並已遷徙到中國的羌人，史稱「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而已方僅「軍士死者四百餘人」。但現今的香港與繳械內徙後毫無自衛能力的羌人不同，加上國際社會的關注援助，中國縱然想「白刃加頸」，也不得不有所顧慮。香港人顯然也非常清楚，只有盡可能地抵抗，才會有一絲的希望——正如一名臺灣財經學者所說的：「跪下也

5 從當今的中共政府插手達賴喇嘛轉世以圖控制西藏的政策，亦可知其端倪。

6 五十年代，中共以開會為名誘捕藏人領袖亦是其來有自。

7 《後漢書》卷 65〈皇甫段熲列傳〉載：熲上言「……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不見得會好」。那些期待和平而向漢朝投降的羌人，最後不分男女老少都慘遭屠戮；而在家園抵抗的羌人，雖也歷經苦難，但終究還是繁衍了下來。直到清朝末期，因現代武器的出現，才使當地的人口結構發生根本的改變。

在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專制統治下，只有一以貫之的暴力壓迫與奴役順從，對於享有或經歷過自由的人民而言，這樣的統治是難以承受的壓迫，即使面臨殘酷的屠殺或鎮壓，也不甘於輕易屈服。

肆、契丹以一國兩制成功治漢

至於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於 1980 年代提出的用詞，並已寫入中國憲法，中國政府稱之為「關於國家統一乃至人類未來發展之科學理論」（王振民，2017）。這種說法當然是自吹自擂，因為即使在中共史上，首開一國兩制的，也是毛澤東對西藏的所謂《十七條協議》。而且，中共建政 70 年，分別在西藏和香港實行過一國兩制，而西藏的一國兩制只維持了 8 年。現在的西藏，根據自由之家《2019 世界自由度報告》的評比，其人權狀況只比戰亂中的敘利亞好一點，是全球倒數第二。至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作為專制中國與國際社會溝通的管道，中國在香港具有巨大的利益，因此雖然維持了 23 年，但隨著中國自恃強國崛起而愈見專橫霸道，若非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香港人民極力的反抗，恐怕早已步上西藏的後塵。

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國兩制」本身是個失敗的制度，因為在廣義的中國史上，一千多年前契丹人就曾豎立起非常成功的一國兩制的典範。當時的大遼國，因為燕雲十六州成為其領土後，新增了大量漢人臣民，因而契丹人便創制了「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一國兩制（劉學銚，2005，195-196），這一重要治國之策，是保證遼朝 200 多年平穩統治的重要原因。1089 年出使遼國的蘇轍，在其奏章〈二論北朝政事大略〉中稱，遼國雖然「寬契丹，虐燕人」，但又承認「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契丹人顯然還是尊重漢人的文化，如契丹人做了漢制的南面官，就要穿戴漢人的衣冠，因此贏得了漢人的信任和認同，不僅漢人契丹化很嚴重，遼國的步兵還是由漢軍所組成的，並始終效忠於遼國。也有很多漢人成為國家的棟樑，如蘇州人韓知古，被契丹人擄掠，後成為阿保機的佐命

功臣；其子韓匡嗣、孫韓德讓，均大受重用。

雖然儒家士大夫階層津津樂道於中國的制度和文化的，但對比東漢時歸順的羌人和遼國的漢人，羌人在中國的一國一制下慘遭屠戮，漢人在遼國的一國兩制下卻自得其樂。而且，一國兩制在游牧契丹人的遼國可以運行二百餘年，漢、番人民和睦相處；而在中共專制下，不過幾年或十幾年，就弄得天怒人怨。

伍、問題的根源在專制暴政的獨裁統治

其實，不論和平協議、一國兩制、統一或分裂，都不是問題的核心。在中國的東漢朝廷，羌（藏）人可以投降或歸順，可以接受被驅離家園，遷徙到中國，變成中國臣民，卻無法忍受東漢中央集權專制下暴虐的統治。在中共政府統治下，香港人也沒有反對香港成為中國一部分，也為其一國兩制的自由法治而感到驕傲。但當中共政府試圖改變這一切時，香港人做出了最激烈的反應。不論是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或是現今中共政權，和平協議與一國兩制問題的真正根源，顯然在專制暴政的獨裁統治。

這種專制暴政政權為了遂其目的而不擇手段，視欺騙詐術為謀略，不論是憲法、條約或是中國領導人的承諾，沒有什麼是可以真正信任的；任何荒謬的法令、泯滅人性的事都可以發生。這一切才是中國之瘤，而且至今仍在危害中國的人民，侵害著西藏、維吾爾、香港等的基本人權，威脅著臺灣的自由民主。

四中全會前夕，習近平再次表明他要追求中國自己的治理方式和國際秩序等，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的中國專制制度，甚至幻想通過「一帶一路」、「孔子學校」以及統戰收買等方式，將這種與現代社會和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獨有「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地。顯然，中共專制統治尚未終結時，不論是「和平協議」、「一國兩制」或其他任何的善意規劃，都很可能成為一廂情願的空談。

達賴喇嘛一再提醒，70 億人類都是兄弟姐妹，有人類的一體性，所以達賴喇嘛提到他的理想：「我希望世界不要有戰爭，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對話和協商來解決」。「和平協議」或「一國兩制」，象徵的其實是對話協商、不同群

體和諧共存的手段，可謂是人類解決自身問題的智慧。可惜，在專制中共政府眼中，卻只能是遂其獨裁專制目的之手段而已。

參考文獻

- 王振民主編。2017。《「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歷史、現實與未來》（憲法與基本法研究叢書）。香港：三聯。
- 西藏流亡政府。1993。《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聞部。
- 格勒。1988。〈藏族源於「發羌」的幾點質疑〉。《中國藏學》2：79-87。
- 達瓦才仁。2019a。〈西藏沒有農奴制，和中國簽的是和平協議〉。《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1229554>。2019/05/01。
- 達瓦才仁。2019b。〈西藏抗暴 60 週年：流亡一甲子，漫漫自由路〉。《思想坦克》，<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705/3689831>。2019/03/11。
- 劉漢城。2019。《用中國的官方權威文獻明證：西藏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北：雪域。
- 劉學鈞。2005。《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台北：知書房。
- 鄭崇生。2019。〈美國務卿蓬佩奧：中共的核心問題是不守承諾〉。《自由亞洲電台》，<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rc-10222019104823.html>。2019/10/22。
- 邁克爾·C·范沃爾特·范普拉赫著，達瓦才仁譯。2011。《西藏的地位》。台北：雪域。